

# 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跨地区 流动决策的影响研究

颜银根

**【摘要】**针对近年来省内跨市流动比例不断上升的现象,文章利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流动距离及跨区流动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由于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在信息接纳能力、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方面的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偏向远距离的流动,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U”形关系;(2)相对其他群体,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偏好省内跨市流动;(3)大专和本科学历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比重提高,促进了中国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比例增加。文章认为,政府应当关注流动人口流动范围的转变,适时做出产业结构调整并引导人口合理流向,避免造成地方经济波动、失业增加及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形成集聚阴影效应。

**【关键词】**流动人口 受教育程度 流动距离 省内跨市流动

**【作者】**颜银根 南京审计大学政治与经济研究院,副教授。

##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中国劳动力在空间上的流动尤其是跨省流动理应增强。然而,2014~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跨省流动比例从 2014 年的 50.96%下降到 2017 年的 49.29%,同一时期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比例却从 30.33%上升到 32.95%<sup>①</sup>。

跨省流动比例的下降及省内跨市流动比例的上升,导致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消费能力等受到影响,进而地区的制造业、房地产业、服务业、就业率及经济增长率等受到冲击。2018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9.5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3.37%,人户分离现象较为严重(国家统计局,2019)。一些研究指出,省内跨市流动的农民工市民化意

\* 本文为 2018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江苏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困境与破解研究”(编号:18EYZ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根据 2014~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加工整理。

愿和能力均高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宁光杰、李瑞,2016)。因此,跨省流动人口比例的下降及省内跨市流动人口比例的上升,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近年来,影响中国流动人口跨地区流动决策的因素,以及流动范围偏好发生了哪些变化,需要从中国人口流动新出现的两个特征进行分析。

第一,中国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加。虽然省内流动一直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迁移方式,但1990~2005年跨省流动比重持续增加,并于2005年达到46.1%(段成荣等,2019)。近些年,流动人口中省内跨市流动比例逐渐上升。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数据显示,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从2011年的24.8%逐步上升至2016年的27.3%。人口流动范围的不同意味着流动距离的远近,其收益和成本也会随之变化。一方面,流动距离越远,越有可能获得更匹配的工作岗位、更好的公共服务及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流动距离越远,越有可能会脱离方言区(刘毓芸等,2015),所能获得的信息在不断减少,生活习惯也需要随之改变,从而心理成本会增加。换言之,流动人口决策时需要在远近距离的利与弊之间进行权衡。

第二,中国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正在不断提高。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占比达13.8%,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达8.1%;同样,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高达17.4%。高学历<sup>①</sup>人群在信息接收方面具有优势,更有可能在大城市获得匹配的工作岗位,在流动过程中获得的收益相对更高(Dahl,2002),众所周知,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在跨地区流动过程中成本和收益不同,进而他们在跨地区的流动中做出的决策也不同。

受教育水平改变流动人口的心理成本和所获信息量,进而对流动人口的区位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远距离迁移。李强(2003)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不仅会影响流动距离,也会影响流动范围。胡枫、王其文(2008)研究发现,外出打工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跨省流动概率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与跨省流动概率呈倒“U”形关系。然而,郭力等(2011)的研究结论与此不同,认为小学及以下的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较低,但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并无太大差异。

从现有文献看,有关教育与跨地区流动决策的相关研究中仍有3方面的问题尚未解决:(1)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的关系。有研究认为,受教育水平越高迁移距离越远,但未对二者可能存在的“U”形关系进行探析(李强,2003)。(2)受教育程度对跨地区流动决策的影响。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选择农民工作为分析对象,跨区流动决策也只区分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未选择流动人口作为分析对象,未将省内流动进一步细分为省

<sup>①</sup> 为便于研究,本文将获得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定义为高学历者,获得中等教育(初中、高中)者定义为中等学历者,初等及以下教育(小学、未上学)者定义为低学历者。

内跨市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胡枫、王其文,2008;郭力等,2011)。(3)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比例上升的原因。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比例增加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其原因鲜有文献提及。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信息接纳能力、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角度分析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的关系,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群对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及市内跨县流动的偏好程度,以及中国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比重上升的原因。

## 二、理论机制与假说

流动人口在空间流动时,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做出权衡。尽管远距离的流动能够带来更匹配的工作岗位和更高的收入,但流动成本也会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对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而言,在信息接纳能力、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且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发生不同的变化,进而导致他们在跨地区流动的决策中表现迥异。

### (一) 信息掌握与迁移距离

信息和知识在传输过程中会出现衰减(Keller,2002),远距离的流动也就意味着流动人口所能获得的信息更少。流动人口对信息的获取在流动前后均存在,流动前需要获得就业等信息,流动后在流入地同样需要获得生活信息。流动之前,流动人口通常会通过多种渠道去获得信息,如从亲戚、同乡、同学等流动网络中通过他人获得就业信息(Epstein,2008),或从网络、报纸等获得就业信息。流动后仍然可以通过流动网络获得信息,但通过个人获得和处理信息变得更加重要。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随着迁移距离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其流动范围的决策。对高学历者而言,他们在获取信息 and 处理信息方面能力更强,倾向于自己通过网络、报纸等去寻找工作(贾伟、秦富,2016)。这种能力在跨地区流动中不会因流动距离增加而大幅减弱。由于流动距离对高学历者的信息掌握影响甚微,因而他们更倾向于远距离的流动。对低学历者而言,他们更加擅长使用流动网络,搜寻工作主要依赖亲戚朋友等介绍(贾伟、秦富,2016)。虽然他们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相对较弱,但流动网络掌握的信息不会因距离的变化而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流动距离对低学历者的信息掌握影响甚微,他们更倾向于远距离的流动。对中等学历者而言,中等学历者在流动网络和自我信息掌握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可能存在信息获取和处理的最优流动距离,其最终掌握的信息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会出现先增加后减少的情形。

### (二) 心理成本与迁移距离

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流动人口的心理成本会因语言、生活习惯及习俗等的改变而不断增加(Boski,2013)。流动人口迁移的心理成本与其环境适应能力息息相关,这种成本对于环境适应力强的流动人口相对较低,但对于环境适应力弱的流动人口则相对较高。因此,一些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另一些农民选择留守本地。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流动的心理成本随着迁移距离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从而影响其流动范围的决策。众多研究指出,教育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Courchene, 1970; Schwartz, 1976),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心理成本,并最终影响流动的距离。随着学历的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学习生活的机会增加,而这段在城市学习的经历导致其就业时心理成本相对较低(周皓, 2004)。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城市适应能力越强,其流动的心理成本越低(赵耀辉, 1997)。高学历流动者流动的心理成本总是较低,流动距离影响甚微;而低学历劳动者流动的心理成本总是较高,流动距离的影响甚微;但对中等学历的流动者,流动距离的影响明显,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心理成本会出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

### (三) 制度成本与迁移距离

制度成本是人口流动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赵耀辉, 1997),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决策。近年来,尽管部分省份或地级市的行政部门已经开始统筹,并可以跨县、跨市办理相关业务,但很少有可以跨省统筹办理的。整体而言,这种制度成本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也有所增加,进而影响流动人口的流动和跨地区流动决策。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面临的制度成本随着流动距离变化也会产生较大变化,从而影响其流动范围的决策。高学历流动者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都容易落户或获得居住证,距离对其流动影响不大;低学历流动者在各种规模等级的城市落户均较难(吴开亚等, 2010),流动距离对其影响同样不大;而随着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放开<sup>①</sup>,中等学历的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流动时面临较大的制度成本差异,流动距离的远近对其影响较大,存在最优流动距离的问题。

流动人口在流动决策中会根据净收益来进行选择(Sjaastad, 1962),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加,教育的回报率也会增加(Levy 等, 1974; Schwartz, 1976; Dahl, 2002)。权衡迁移收益与上述分析的信息接纳能力、心理及制度等成本,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动者会产生不同跨区域流动决策。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高学历和低学历流动者成本增加相对较少,收益却大幅增加,因而倾向于远距离迁移,如跨省流动。然而,中等学历流动者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成本增加超过收益的增加,因而倾向于近距离迁移,如市内跨县流动。在高学历者的群体中,研究生的竞争力更强(杨薇、孔东民, 2019),大专和本科学历流动人口跨省远距离流动的收益正在下降,因而他们会选择从跨省流动转向省内跨市流动以替代跨省流动。据此,本文提出理论假设: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U”形关

<sup>①</sup> 2013 年召开的首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中对于落户政策进一步放松,指出“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300 万的 II 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 万的 I 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



系,大专和本科学历流动人口更偏好流向省会的省内跨市流动,该群体占流动人口比重提升导致中国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比重提高。

### 三、计量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特征

####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呈“U”形关系,因此,本文计量模型设定为:

$$MD_i = \alpha_0 + \alpha_1 edu_i + \alpha_2 edu_i^2 + \delta \bar{z}_i + \varepsilon_i \tag{1}$$

式(1)中, $MD_i$ 为个体*i*的流动距离, $edu$ 为受教育年限, $\alpha$ 、 $\delta$ 为待估计系数, $\varepsilon$ 为误差项。 $\bar{z}$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个体的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流动时长、父母流动经历、首次流动单独流动及从商等变量。而对于到底选择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还是市内跨县流动,流动人口面临多项选择。本文采用普通的多项 Logit 选择模型。即:

$$D_i = \beta_0 + \beta_k edu\_k_i + \gamma \bar{z}_i + \eta_i \tag{2}$$

式(2)中, $D_{i,j}$ 为流动范围的选择项, $edu\_k_i$ 为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虚拟变量, $k=1, 2, \dots, 7$ 。在多项选择中,本文更希望看到不同学历的群体相对其他群体的偏好,因而在式(2)中仅保存某个受教育程度变量分别进行回归,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虚拟变量之间也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式(2)中其他的控制变量与式(1)相同, $\beta$ 为待估计系数, $\gamma$ 为控制变量向量待估计系数, $\eta$ 为误差项。

#### (二) 数据来源、处理与特征

本文主要使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sup>①</sup>,该数据包含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而在分析近年来流动人口的学历变化及省内跨市流动方向时,使用 2014~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中主要被解释变量包括个体的流动距离和流动范围。其中,个体的流动距离根据流入地(现居住区县)和流出地(户籍地区县)经纬度球面距离计算获得,流动距离的 25%分位数为 95.997 千米、中位数为 285.659 千米、75%分位数为 775.269 千米,最大值为 4 194.261 千米;个体的流动范围为调查数据中的内容,“跨省流动”设定为 1,“省内跨市流动”为 2,“市内跨县流动”为 3。其中,流动距离、观察值为 134 487;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市内跨县流动样本分别为:68 493、43 329、22 665。

① 数据调查时间节点为 2017 年 5 月 1 日零时。

2. 解释变量

文中核心解释变量为受教育程度,其中受教育年限根据调查数据中的学历计算得到<sup>①</sup>。此外,根据流动人口的学历水平得到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虚拟变量( $edu\_k_i$ )。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为避免变量遗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增加了一系列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其中,年龄根据数据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获得;性别虚拟变量设定“男性”为1,女性为0;婚姻状况虚拟变量设定“初婚”“再婚”等已婚为1,“未婚”“离婚”“同居”等不在婚为0;民族虚拟变量设定少数民族为1,“汉族”为0;流动时长变量根据调查年份减去“第一次离开户籍地(县级)的年份”获得;父母流动经历虚拟变量设定“父母均有”“仅有父亲”“仅有母亲”为1,“父母均没有”为0;首次流动单独虚拟变量设定“独自流动”为1,与“配偶”“父母或岳父母或公婆”“子女”“兄弟姐妹”“亲属”“同学”“同乡”一起流动为0;从商虚拟变量设定“从商”为1,“务工或就业”为0。此外,为控制流入地和流出地特征,在采用OLS分析时同时加入流入地和流出地虚拟变量。

本文最初样本为169 989个,剔除65周岁以上和15周岁以下人口数据,根据“第一次离开户籍地(县级)的年份”及出生年月,删除初次流动年龄小于15周岁的流动人口。保留“本次流动原因”为“务工或工作和经商”两类样本,删除了“家属随迁”“婚姻嫁娶”“拆迁搬家”“投靠亲友”“异地养老”“其他”“照顾自家小孩”等被动决策迁移行为的样本,最终获得134 487个研究样本,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N=134487)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受教育年限	10.065	3.180	0	19
受教育年限平方	111.410	64.362	0	361
年龄	36.356	9.626	15	65
性别	0.569	0.495	0	1
婚姻状况	0.826	0.379	0	1
流动时长	11.082	7.630	0	50
少数民族	0.089	0.284	0	1
父母流动经历	0.200	0.400	0	1
单独流动	0.453	0.498	0	1
经商	0.275	0.447	0	1
未上过学	0.022	0.145	0	1
小学学历	0.139	0.346	0	1
初中学历	0.449	0.497	0	1
高中学历	0.217	0.412	0	1
大专学历	0.103	0.303	0	1
本科学历	0.065	0.246	0	1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0.006	0.075	0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

表2给出了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的OLS回归结果。其中,模型2至模型6加入了

① 统计数据中受教育程度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七类,按照劳动经济学中常用设定及常用的学制,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0、6、9、12、14、16、19年。

控制变量及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固定效应。考虑到不同时期流动个体面临的异质性,模型3和模型4分别给出了1978年后和1992年后的回归结果、模型5和模型6分别给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80后、90后农民工)的回归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1至模型6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显著为负,受教育年限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流动距离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模型3的受教育年限二次项系数为0.233、一次项系数为-4.353,模型4中的二次项系数为0.239,一次项系数为-4.686,二者并无太大差异。这表明,无论是1978年还是1992年这一结论均成立,但1992年整体流动距离更远,学历差异带来的流动距离差距变小。对于两代农民工而言,同样存在这样的规律。模型5受

表2 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的OLS回归结果

变 量	全体		1978年以后流动	1992年以后流动	一代农民工	二代农民工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受教育年限	-21.746*** (1.893)	-4.353*** (1.288)	-4.430*** (1.296)	-4.686*** (1.338)	-12.887*** (2.607)	-5.332*** (1.661)
受教育年限平方	0.436*** (0.094)	0.229*** (0.063)	0.233*** (0.064)	0.239*** (0.065)	0.583*** (0.115)	0.411*** (0.098)
男性		18.716*** (2.149)	18.756*** (2.152)	18.703*** (2.187)	20.299*** (2.807)	14.716*** (3.361)
年龄		-0.455*** (0.149)	-0.444*** (0.150)	-0.362** (0.152)	-0.950** (0.416)	-0.883*** (0.284)
已婚		2.145 (3.171)	1.955 (3.183)	1.060 (3.234)	3.030 (3.950)	0.374 (7.228)
流动时长		-0.348** (0.168)	-0.284 (0.173)	-0.156 (0.192)	0.116 (0.342)	-0.868*** (0.200)
少数民族		16.376*** (5.148)	16.547*** (5.160)	15.521*** (5.241)	13.591** (6.650)	14.405* (8.281)
父母流动经历		0.797 (2.761)	0.516 (2.766)	1.346 (2.811)	2.107 (3.221)	4.700 (5.999)
单独流动		-11.334*** (2.310)	-11.494*** (2.319)	-11.338*** (2.381)	-18.660*** (3.062)	-1.843 (3.581)
经商		34.857*** (2.710)	35.343*** (2.721)	37.604*** (2.795)	55.710*** (3.811)	11.937*** (3.883)
常数项	696.251*** (9.567)	546.071*** (9.290)	545.399*** (9.354)	541.015*** (9.648)	579.957*** (18.846)	605.538*** (17.259)
观察值	134487	134314	133344	128029	77498	56488
拟合优度	0.0052	0.6257	0.6260	0.6234	0.6018	0.7015

注:除模型1外,其他模型均控制了流入地和流出地固定效应。\*、\*\*、\*\*\*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教育年限二次项系数 0.583 略大于模型 6 中的 0.411, 一次项系数 -12.887 小于模型 6 中的 -5.332, 模型 5 中的常数项略小于模型 6。这表明, 第一代农民工整体迁移距离比第二代农民工更近, 受教育年限对迁移距离的影响明显大于第二代农民工。整体而言, 受教育程度低和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远距离流动, 而受教育程度处于中间水平的流动人口则偏向于近距离的流动, 这与以往的研究 (Schwartz, 1973; 李强, 2003) 存在较大差异。

在控制变量方面, 表 2 结果显示, 男性、年龄小、流动时长较短者、少数民族、有亲朋好友和家人一起流动及从商的流动人口更偏向于远距离流动。相对而言, 男性的适应能力较强, 这与中国传统思想“好男儿志在四方”是一致的; 受“落叶归根”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加, 流动人口更偏向于近距离的迁移; 流动时间较长者受初期流动交通的影响, 整体流动距离较近; 由于少数民族地理分布较为偏远, 因而流动距离更远; 在亲朋好友的带动下会大大降低外出流动面临的风险, 因而流动距离相对较长。

## (二) 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范围

表 3 给出了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范围的多项选择 Logit 回归结果, 以省内跨市流动作为基准结果。从表 3 可以看出, 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对流动范围的选择存在较大的差异。未上学、小学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在 1% 的水平下的跨省流动系数分别为 0.155、0.233、0.715, 市内跨县流动系数分别为 -0.273、-0.070、-0.503。这表明, 他们的跨省流动偏好程度超过省内跨市流动, 而省内跨市流动的偏好超过市内跨县流动。主要是因为这类流动人口信息接纳能力、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受城市等级的影响较小, 收益随着迁移距离及城市等级变化影响较大, 因而更偏好于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流动。初中学历的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系数和市内跨县流动系数均大于零, 在 1% 的水平下回归系数分别为 0.182 和 0.145, 表明他们更偏好跨省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 因为对初中学历的流动人口而言省内跨市的流动带来成本的增加较多, 而收益增加却相对较少。高中学历的流动人口跨省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系数分别为 -0.198 和 0.090, 其流动偏好依次为市内跨县流动、省内跨市流动、跨省流动。其原因在于这类群体的制度成本受城市等级的影响较大, 学历上的优势在市内跨县及省内跨市的流动中更易凸显。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无论是跨省流动还是市内跨县流动系数均为负, 其中跨省流动系数分别为 -0.445 和 -0.229、市内跨县流动系数分别为 -0.043 和 -0.249。换言之, 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偏好省内跨市流动, 主要是由于这类流动人口的学历优势在省内跨市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同时其制度成本等相对较低。

与女性相比, 男性对不确定性有更强的偏好, 更倾向于跨省流动; 已婚者既有家庭的牵挂, 又有对收入更高的预期, 更偏好距离适中的省内跨市流动; 跨省意味着环境的变化更大, 单独流动难以适应, 因而首次流动单独流动者更加倾向于市内跨县的流动。



表3 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范围的多选择分析结果(N=134490)

变 量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跨省流动(省内跨市)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0.155***						
小学		0.233***					
初中			0.182***				
高中				-0.198***			
大专					-0.445***		
本科						-0.043*	
研究生及以上							0.715***
男性	0.058***	0.065***	0.043***	0.060***	0.048***	0.053***	0.054***
年龄	-0.001	-0.003***	-0.000	-0.002*	-0.003***	-0.001	-0.001
已婚	0.033*	0.037**	0.025	0.027	0.035*	0.031*	0.028
流动时长	0.016***	0.016***	0.015***	0.016***	0.015***	0.016***	0.016***
少数民族	-0.550***	-0.566***	-0.534***	-0.554***	-0.558***	-0.541***	-0.539***
父母流动经历	0.204***	0.207***	0.205***	0.209***	0.205***	0.204***	0.206***
单独流动	-0.210***	-0.198***	-0.187***	-0.207***	-0.173***	-0.208***	-0.218***
经商	-0.044***	-0.042***	-0.059***	-0.039***	-0.062***	-0.047***	-0.041***
常数项	0.369***	0.399***	0.280***	0.435***	0.473***	0.366***	0.355***
市内跨县(省内跨市)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0.273***						
小学学历		-0.070***					
初中			0.145***				
高中				0.090***			
大专					-0.229***		
本科						-0.249***	
研究生及以上							-0.503***
男性	-0.007	-0.004	-0.009	-0.004	-0.004	-0.002	-0.001
年龄	0.004***	0.004***	0.003***	0.004***	0.002*	0.003**	0.003***
已婚	0.121***	0.122***	0.120***	0.126***	0.127***	0.127***	0.125***
流动时长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少数民族	0.043*	0.037	0.035	0.037	0.020	0.027	0.029
父母流动经历	-0.113***	-0.115***	-0.113***	-0.116***	-0.113***	-0.116***	-0.115***
单独流动	0.029	0.027	0.049***	0.028	0.051***	0.049***	0.032*
经商	0.182***	0.183***	0.171***	0.180***	0.173***	0.171***	0.181***
常数项	-0.842***	-0.838***	-0.891***	-0.865***	-0.765***	-0.796***	-0.826***
卡方	2368.983	2549.486	2522.408	2620.282	2780.271	2363.746	2446.791

注:括号内为参照组。\*、\*\*、\*\*\*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

由于迁移存在一定的迁移成本,早期迁移的流动人口受限于交通因素的影响,并且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中城市,因而流动时间较长者倾向于省内跨市流动;少数民族居住相对较为集中,尤其是存在着少数民族自治州,因而他们要么倾向于跨省流动以获得高收益,要么偏好市内跨县流动以更好地适应语言、习俗等环境。

五、进一步的讨论

(一) 流动人口学历变化情况与省内跨市流动增加

图 1 显示了 2014~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的学历变化。从图 1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呈上升态势。整体而言,初中及以下的流动人口比重在下降,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比重在上升。2014~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从 2014 年的 87.13%下降到 2017 年的 79.18%,大专学历的流动人口从 2014 年的 8.42%上升到 2017 年的 11.93%,本科学历流动人口从 2014 年的 4.11%上升到 2017 年的 7.2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从 2014 年的 0.33%上升到 0.73%。近年来,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

(二) 流动人口学历与省内跨市流动的动态变化

图 2 显示了 2014~2017 年不同学历的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的动态变化情况。从图 2 可以看出,2014~2017 年,高中、大专及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省内跨市流动比例最高,并且大专及本科学历的人群有快速增加的趋势。

大量人口在大城市的集聚,促使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和房价快速上涨。因此,一些流动人口开始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选择二线甚至三四线城市。而对于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而言,本省省会城市无疑是一个能够提高其福利水平的选择。近几年,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省内跨市流动,这也是中国省内跨市流动近年来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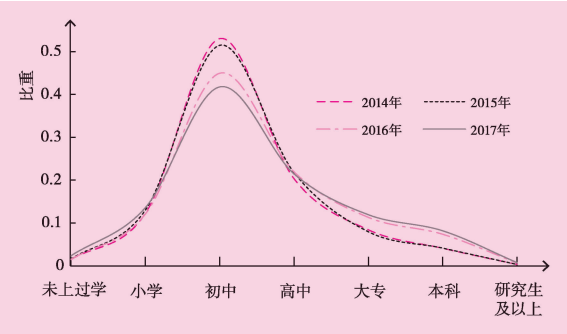


图 1 2014~2017 年流动人口学历变化情况  
注:对离散图进行了平滑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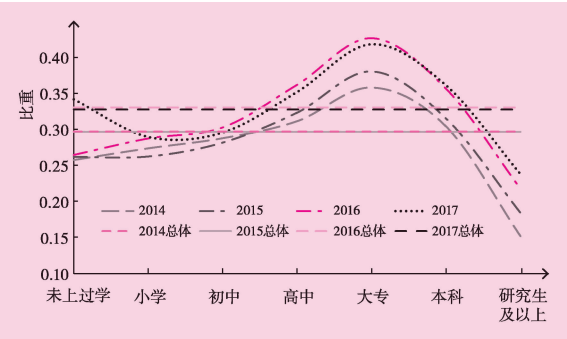


图 2 2014~2017 年不同学历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动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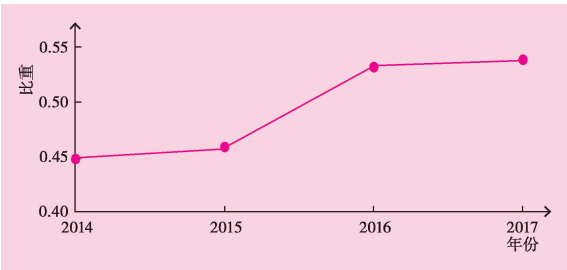


图 3 2014~2017 年省内跨市流动人口中  
流向省会比例

### （三）省会城市发展与省内跨市流动

图 3 显示了 2014~2017 年省内跨市流动人口中流向省会城市的人口比重。从图 3 可以看出,省内跨市流动的比重不断上升,从 2014 年的 44.84% 上升到 2017 年的 53.91%。近些年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变强,首位度不断提升,为流动人口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便利。因此,流动人口省内跨市流动更加倾向于向省会城市流动,进而替代了以往的跨省流动。

##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 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检验了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如何影响跨区域流动决策,得到以下 3 个主要结论:(1)由于不同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信息掌握、心理成本和制度成本方面的差异,导致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U”形关系,低学历和高学历者偏好远距离的流动。无论是 1978 年还是 1992 年,抑或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这一规律一直存在。但在 1992 年后及第二代农民工间,这一规律开始减弱。(2)受信息掌握、心理成本及制度成本的影响,未上学、小学学历和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跨省流动偏好程度超过省内跨市流动,而省内跨市流动的偏好超过市内跨县流动;初中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偏好跨省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高中学历的流动人口流动偏好依次为市内跨县流动、省内跨市流动、跨省流动;大专和本科学历的流动人口偏好省内跨市流动。(3)流动人口中大专和本科学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流动偏好的增强及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逐渐变强,都促进了更多的大专和本科学历者选择本省跨市尤其是向本省省会城市流动替代跨省流动。

流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或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因而关注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跨地区流动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中国大城市的拥挤成本逐步显现,一些城市“赶”人,一些城市“抢”人,部分流动人口也开始重新选择区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地方政府根据人口流动偏好,应当适时做出人口的学历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对于不同等级的城市要采取相应的制度设计调整学历结构,同时根据人口学历结构布局相应产业:随着拥挤效应的增加,大城市挤出了大专和本科学历人群,这对于以产业多样化发展为导向的大城市极为不利;中小城市中无论是低学历还是高学历人群都相对较少,对于这类人群的吸引同样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尤其是对于高学历的人才引进亟待加强。(2)合理引导大专

和本科生学历者回流,避免造成地方失业增加及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形成集聚阴影效应。由于大专、本科学历者更偏好省内跨市流动,其中多数选择本省的省会城市,这无疑为省会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对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流向上看,大专和本科学历者主要流向本省省会城市,应当避免这类人群集中流向省会城市导致省会城市失业率增加。同时,应控制省会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等资源的吸附而形成集聚阴影,避免造成省内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加剧。

###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9):《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2. 郭力等(2011):《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背景下农民工跨省流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地区6省的农户调查》,《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3. 胡枫、王其文(2008):《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4. 贾伟、秦富(2016):《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作搜寻的影响分析》,《江汉论坛》,第8期。
5. 李强(2003):《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6. 刘毓芸等(2015):《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经济研究》,第10期。
7. 宁光杰、李瑞(2016):《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流动范围与市民化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8. 吴开亚等(2010):《户籍改革进程的障碍:基于城市落户门槛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9. 杨薇、孔东民(2019):《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人力资本结构调整》,《金融研究》,第6期。
10. 赵耀辉(1997):《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11. 周皓(2004):《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第6期。
12. 段成荣等(2019):《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人口研究》,第2期。
13. Boski, P. (2013), A Psychology of Economic Migr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7):1067-1093.
14. Courchene, T.J. (1970),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Adjustment.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 3(4):550-576.
15. Dahl, G.B. (2002), Mobility and the Return to Education: Testing a Roy Model with Multiple Markets. *Econometrica*. 70(6):2367-2420.
16. Epstein, G.S. (2008), Herd and Network Effects in Migration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4(4):567-583.
17. Keller, W. (2002),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1):120-142.
18. Levy, M.B., Wadycki, W.J. (1974), Education and the Decision to Migrate: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Migration in Venezuela. *Econometrica*. 42(2):377-388.
19. Schwartz, A. (1976), Migration, Age, and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4, Part 1):701-720.

(责任编辑:朱 犁)